

总主编◎王松林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

A Social Discourse Approach to the Subjectivity  
of Buddhist Sutra Translators and Modern  
Western Social Science Translators

# 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

## ——以佛经译者和 近现代西学译者为中心

贺爱军 著



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资助项目  
宁波大学学科建设重点培育学科点资助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浙籍译家群研究”（编号：11JCWY02YB）

总主编◎王松林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

A Social Discourse Approach to the Subjectivity  
of Buddhist Sutra Translators and Modern  
Western Social Science Translators

# 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

## ——以佛经译者和 近现代西学译者为中心



贺爱军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译者主体与主体性为切入点,以社会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将译者主体性的审视与考量放在佛经翻译和近现代西学翻译的背景之中,探究译者主体在文本操作层面呈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社会历史语境、诗学规范和语言使用层面体现出来的客观受动性。

本书建构的社会话语分析理论框架具体包括源文和译文对照分析的微观行为,译者主体性提炼与分析的中观行为,以及社会历史语境、诗学规范和语言形式的宏观行为。具体而言,社会话语分析以文本分析为出发点,从中提炼出译者主体性的文本表征,然后将主体性特征置放在社会历史语境、诗学规范和语言形式下予以透视和洞观。

本书采用了理论思辨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呈现译者主体性的全景图。本书建构的理论框架,提炼的主要观点对翻译研究人员、翻译和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以佛经译者和近现代西学译者为中心/贺爱军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10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王松林主编)

ISBN 978-7-03-045301-3

I. ①译… II. ①贺… III. ①翻译-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9929 号

丛书策划: 阎 莉

责任编辑: 阎 莉 王紫微 / 责任校对: 蒋 萍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c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10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1/4

字数: 227 000

定价: 7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 丛 书 序

本套丛书取名为“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旨在向学界展现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近年来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研究特色，丛书涵盖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化研究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在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或曰研究方向主要有外国语言研究(含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应用研究及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等)、外国文学研究(含文学理论与批评)、翻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其中，外国语言研究属于语言学学科，是研究外国语言及其应用的综合性学科，主要涉及语音学、音位学、词汇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基础性的语言本体研究，也涉及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等理论流派研究，还涉及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文体学、语篇分析等跨学科领域。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外语的教学、使用、规划和政策以及二语习得、外语能力测评、双语和多语现象、语言与思维、心理活动及行为的关系、言语产品的加工与合成(含机器翻译)、词典学等，不一而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影视研究、性别研究、种族研究、数字媒介研究及新闻传播研究等诸多与其他人文学科相关的内容纳入到了本学科的研究范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发展迅猛，大量国外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包括翻译理论)、文学批评理论及文化批评理论由中国外语界学者介绍、吸纳和消化并自觉地运用到他们的研究领域。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研究疆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开阔，跨学科、多界面的研究催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譬如，近年来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就大量吸收了语言哲学、心理学、脑科学、系统论等学科的成果，不再囿于学科内部的界面研究；其他如神经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也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外国文学研究也在世界多元化浪潮语境下呈现出超越和打破传统研究界限的局面。在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外国经典文学被视为研究的“正典”，而通俗文学往往被边缘化，时至今日，这一泾渭分明的研究界线已被打破；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多视角的文学批评方式如生态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和

种族批评以及文化研究等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涵，文学研究的空间不断扩大和深化；网络文学这一借助超文本和多媒体载体的互动性极强的文学表现形式颠覆了传统的写作范式，成为当下学者不可回避的研究课题；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政治、伦理、法律、环境、族群、性别等诉求备受关注。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门跨学科的多界面的学问，它建立在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信息论、心理学等交叉学科之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纯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比重有所减弱，跨界面的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不断引入翻译研究，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所涉及的因素和问题的复杂性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翻译研究自然也必须呈现出跨学科的开放姿态。综上所述，二十一世纪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将迎来一个开放性的、跨学科的崭新时代。宁波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也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学科融合中积累着研究成果，凝练着学科特色，沉淀着学术滋养。

宁波大学是由国家教育部、国家海洋局、浙江省和宁波市共建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在1986年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创立，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建校之初，由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原杭州大学五校对口援建；1996年，原宁波大学、宁波师范学院和浙江水产学院宁波分院三校合并，组建为新的宁波大学，成为学科门类齐全、科教特色鲜明的综合高校；1992年被列为全国高校招生第一批录取院校；1995年首批通过原国家教委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00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省重点建设大学；2003年接受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并获得“优秀”等级；2007年被增列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宁波大学外语学院（起初名为宁波大学外语系）是宁波大学建校之初最早建立的五个专业系科之一，由当时的杭州大学外语系对口援建，办学起点较高，在近三十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学科健全、特色鲜明的办学格局。

宁波是一座开放性的、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港口城市，“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是这座城市的名片。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也是一个开放性、跨越式发展的学科，“笃信达雅”是宁波大学外语学院的院训。本学科拥有一支充满朝气的学术团队，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学科建设取得了突出的进步。2005年本学科成为浙江省唯一的外国语言文学类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新增翻译专业硕士点（MTI）；已建成国家特色专业1个，国家精品课程1门，省创新团队1个，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8项。目前，本学科共有教授20人、副教授30人、博士25人、在读博士5人。近五年来，学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8项（其中在

研 16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 16 项、省哲社规划课题 19 项。近五年来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了 160 余篇论文,覆盖外语类全部核心期刊,出版学术著作及教材 50 余部。基地学术梯队合理,发展潜力巨大。本学科已形成五个稳定的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日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学科在以下研究领域具有特色并在国内学界形成一定影响: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英美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二语习得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日本现当代文学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德语文学与文化研究。本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学科排名在浙江省省属院校中位居前列。据教育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2013 年),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排名第 37 位(并列);教育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2015 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显示,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位居全国同类学科的前 10.5%。

本套丛书得到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中央财政专项(“外国语言文学”)项目的资助以及宁波大学研究生院、宁波大学人文社科处的大力支持,科学出版社与我们真诚合作,旨在打造一批学术精品,既展示已有研究成果,又谋划未来探索之途。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对所有支持和关心过我们的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并真诚期盼继续得到你们的关爱和关心!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和成长得益于我国外语学界诸多前辈和同仁的大力扶持,在此我们深表谢忱!我们祈盼学界专家一如既往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学科建设工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全体教师和科研人员深知学术求索之艰辛,更深知学术追求乃大学教师终其一生力臻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本套丛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宁波大学外语学科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丛书中一定尚存诸多值得商榷的学术问题,敬请海内外方家对其中讹误和瑕疵给予批评指正。

王松林

2015 年 2 月 5 日于爱丁堡

## 前 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译者主体与主体性研究毫无疑问是国内翻译界的学术热点。译界学人对这一主题显示出极大的学术热情，论文、专著纷至沓来，观点、理论层出不穷。这一主题的研究肇始于对翻译主体的叩问，“谁是翻译的主体”这一命题曾迷惑了許多人，之后研究焦点从“谁是翻译的主体”过渡到了译者的主体性表征，人们转而探究译者在文本操作中的“显身”与“隐身”、“顺从”与“叛逆”，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译者受动性的关注。殊不知，译者主体性是由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受动性构成的。对于后者的探讨，因其数量不多，成果不足，因此愈益显得弥足珍贵。笔者以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受动性是译者主体性的不可分割的两面，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包括选择拟译文本、解读源文、决定翻译方法和表达形式。译者的客观受动性首先表现在社会历史语境和时代主题对译者的操控。对译者主体性的探讨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也就是要研究译者当时开展翻译活动的社会历史背景，译者的“顺从”与“叛逆”，译文是充分体现源文，还是照顾了译文读者的接受性，均系于此。其次，译者的客观受动性还体现在诗学规范对翻译实践的制约。翻译策略的制定，翻译方法的选择端赖于此。第三，语言形式同样影响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从佛经翻译到近代科技翻译直至“五四”前后的西学翻译，语言形式的选择关系重大。

本书以译者主体与主体性为切入点，以社会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将译者主体性的审视与考量置放在佛经翻译和近现代西学翻译的背景之中，探究译者主体在文本操作层面呈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社会历史语境、诗学规范和语言使用层面体现出来的客观受动性。翻译研究的社会话语分析指的是从文本分析出发，从中提炼出译者主体性的文本表征，然后将主体性特征置放在社会历史语境、诗学规范和语言形式下予以透视和洞观。源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是社会话语分析的始点，属于微观层面的分析。在文本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推导出译者的主体性，并具体分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受动性，这属于社会话语分析的中观层面。中观层面的译者主体性需要通过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诗学规范解读和语言形式分析进行透视和阐释，从而达到呈现译者主体的完整图像，全面深刻地解读译者的主体性。

中国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的生发方式不同，中国翻译理论遵循的是“问题导

向型”的生发方式。在这一视域之中，佛经译者的主体性呈现出四段式的发展路径：质文对立：实宜径达→五失本、三不易：案本而传→文体殊隔：依实出华→凡圣殊伦：译者八备。按照译者主体的构成，将佛经翻译主体分成外国译者、中外译者和中国译者三个组成部分。在佛经翻译中，中外译者数量比例悬殊，本土译者明显不足，而外来译者数量众多。这一显性特征可以从佛经翻译发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得到解读。古代中国在大部分时间处于强势地位，而且一向自给自足，不假外求，在与别的文化交流时，一般处于主导地位，施与影响多于接受影响。这种强势地位构塑了国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文化心理和文化态度使得主流文化一般将边缘民族和外国人统统贬低为“夷”（野蛮的代名词）。可见，传统主流文化一向认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是他们的分内之事，而中国人则犯不着学习外国语言。主流文化的这种文化自豪感使得清末以前的知识界对于学习外语和外来知识普遍缺乏兴趣。知识界的这份冷漠决定了主流文化对翻译主体所持的态度，中外译者主体构成比例悬殊也就成为题中之义。

佛经译者主体的客观受动性体现在翻译方法的变迁受到佛教在意识形态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和翻译诗学规范两个方面的双重影响。支谦大量运用“格义”的翻译方法，道安对此表示质疑，而鸠摩罗什则摒弃“格义”，提倡“文”译。及至玄奘，首创“五不翻”取代“格义”。翻译方法走过的道路折射出处于意识形态多元系统边缘的佛学思想体系与处于中心的儒、道意识形态体系争夺中心位置的轨迹。随着佛学地位的改变，“格义”的运用也随之波动，直至佛学确立了主导地位，“格义”也走向消亡。

翻译诗学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体的翻译方法。佛经翻译的诗学规范大体经历了起初“质”译为主、后来“文”译通行、南北朝“格义”风行直至唐朝时“文”“质”一体，圆满调和。译者主体深受翻译诗学规范的影响与制约，在翻译过程中呈现出亦步亦趋或借助外力意欲突破的意图。

近现代的译者主体按照译介的内容分为三类——自然科学文献译者、社会科学文献译者和文学作品译者。近代的社会历史语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救亡和启蒙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一历史语境中，诗学规范发生了转变，小说的救世功用被极度放大，翻译小说遂成为时代新宠。翻译语言也实现了逆转，起初严复和林纾的文言翻译独领风骚，紧接着胡适的白话译文蔚然成风。辛亥革命后，鲁迅的欧化文体逐渐流行，翻译方法相应地实现了转变，从随意增删的“豪杰译”逆转为在目的语中保留原文句法、文法的“硬译”。



全书共分十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交代了选题的缘起，介绍研究背景，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

第二章译者主体与主体性的概念与构成，界定了关键词——译者主体和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第三章社会话语分析的发展源流与理论框架，梳理了社会话语分析的理论资源，从语言学、哲学社会学、批评话语分析三个维度梳理了话语与话语分析的概念与内涵，并建构了社会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

第四章理论范式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提出并论述了中国问题导向型与西方范式导向型的翻译理论生发模式，并在问题导向型视角下考查了佛经译者的主体性。

第五章佛经译者主体，按照译者主体的构成将佛经译者主体分为外国译者、中外译者和中国译者，进而由面及点考察这三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译者主体。

第六章佛经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从文本对比分析入手，提炼出不同时期译者主体性的文本表征，并通过再现佛经翻译的社会历史语境解读译者比例悬殊的历史现实，通过佛、儒、道之间的动态推衍分析“格义”翻译方法的嬗变。

第七章近现代西学译者主体与主体性，按照近现代以来译者翻译作品的内容将这一时期的译者主体分为自然科学文献译者、社会科学文献译者和文学作品译者，然后由面入点，分析了每一时期的典型译者的主体性特征。

第八章西学译者主体的社会话语分析，从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语境、小说观念的嬗变和晚清以来翻译语言的转变三个维度解读了小说翻译的盛行和翻译方法的嬗变，解释了翻译方法如何从随意增删的“豪杰译”逆转为保留源文词法、句法的“硬译”。

第九章西学译者主体性的案例分析，以严复和鲁迅为例，分析提炼了他们的译者主体性。以严复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态度和翻译方法为切入点，分析了严复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征；以鲁迅的“硬译”为个案，探究了鲁迅主体性——“硬译”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指出“硬译”是鲁迅对林译模式的反叛，是鲁迅“初善的文化中间物”意识的产物，也是改造中国语言文字的文化策略。

第十章结论，总结提炼全书的核心观点。

本书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三点。

(1)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论述了中国问题导向型翻译理论的生发方式，并以范式导向型的西方翻译理论生发方式为参照，将译者主体性置放在问题导向型的中国翻译史中，探究佛经译者的主体性。

(2) 整合出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话语分析框架，具体包含源文与译文对比的微观分析，译者主体性的中观分析，社会历史语境、诗学规范、语言形式的宏观分析。

(3) 博采史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和翻译学等多学科理论之众长，通过多层次、多角度来审视佛经译者主体性与西学译者主体性，并从翻译诗学规范的维度洞观“格义”方法的推衍，推导出“格义”的演变与意识形态多元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

贺爱军

2015年5月于宁波大学

# 目 录

丛书序	i
前言	v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6
第二章 译者主体与主体性的概念与构成	17
第一节 译者主体性	17
第二节 能动性 与 受动性：译者主体性的构成	21
本章小结	29
第三章 社会话语分析的发展源流与理论框架	30
第一节 语言学中的话语与话语分析	30
第二节 哲学、社会学中的话语与话语分析	32
第三节 批评话语分析	34
第四节 社会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	36
本章小结	37
第四章 理论范式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38
第一节 范式导向型与问题导向型	38
第二节 “问题导向型”视域下的佛经译者主体性	40
本章小结	47
第五章 佛经译者主体	49
第一节 外国译者	50
第二节 中外译者	56
第三节 中国译者	69
本章小结	80
第六章 佛经译者主体性的社会话语分析	81

第一节 佛经译者主体性的文本考察 .....	81
第二节 佛经译者主体性的社会历史语境与诗学规范解读 .....	91
本章小结 .....	103
<b>第七章 近现代西学译者主体与主体性 .....</b>	<b>104</b>
第一节 自然科学文献译者 .....	105
第二节 社会科学文献译者 .....	109
第三节 文学作品译者 .....	112
本章小结 .....	118
<b>第八章 西学译者主体的社会话语分析 .....</b>	<b>119</b>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语境 .....	120
第二节 从世道人心到“国民之魂”：诗学规范的嬗变 .....	123
第三节 文言、白话、欧化：翻译语言的嬗变 .....	126
本章小结 .....	133
<b>第九章 西学译者主体性的案例分析 .....</b>	<b>135</b>
第一节 严复译者主体性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与文本考察 .....	135
第二节 鲁迅译者主体性的社会历史语境解读 .....	144
本章小结 .....	151
<b>第十章 结论 .....</b>	<b>152</b>
<b>参考文献 .....</b>	<b>156</b>
<b>后记 .....</b>	<b>165</b>

# 第一章 导 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

——马祖毅

中西翻译实践源远流长，绵延久远。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然而，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才变为现实。学界一般认为，1976 年在比利时鲁汶举行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标志着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若以此作为起点计算，翻译学迄今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三十多年来，翻译学或翻译研究一直作为一门边缘学科<sup>①</sup>，游走在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缺乏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的职责在于忠于源文，在目标语中寻找源语的对等语。这一研究范式从结构这一切入点来研究双语转换过程，并通过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分析或基于其他实证性资料，分析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在结构和意义上的对等与对应。因此，对等(equivalence)是这一研究取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焦点，可以说，“西方翻译理论至今一直是围绕对等概念演化发展的。”(Sager, 2012: 25)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断言：“只有确立了第三比较体(interlingual tertium comparationis)在翻译理论中的中心地位，翻译学才能呈现出更为清晰的全貌。”(Snell-Hornby, 2001: 15)基于第三比较体的理念，西方翻译理论家先后提出各种各样的对等理念。1947 年，奈达就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1964 年，他进一步明确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并于 1969 年将翻译定义为“在接受语中再现源语信息的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Nida & Taber, 2004:

---

<sup>①</sup> 在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的大学里面，翻译学长期以来没有立足之地；在中国，翻译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仅仅被视为是一门三级学科。1992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定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中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与“语言教学”“话语语言学”等并列。(王宁, 2009: 1)。

12)。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不仅通过对等这一术语来定义翻译——“翻译指的是用目标语中对等的文本材料替代源语的文本材料”，而且还坚持认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在于探寻目标语中的翻译对等语，而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在于界定翻译对等的性质和条件”（Catford, 1965: 20）。1968年，凯德(Kade)提出翻译中的内容对等原则(retention of translation invariance at content level)。20世纪70年代初，语用学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翻译单位的聚焦点也相应地由词、短语转移到了语篇，翻译对等论也相应延伸至语篇。1971年，赖斯(Reiss)以对等论为基础，创立了基于源语语篇和目标语语篇功能关系的交际对等(communicative equivalence)。她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是“目标语语篇和源语语篇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等方面的对等”（Nord, 2001: 9）。威尔斯同样指出，翻译是将源文语篇转换成尽可能与之对等的译文语篇。科勒(Koller)区分了五种类型的对等——外延对等(denotative equivalence)、内涵对等(connotative equivalence)、语篇规约对等(text-normative equivalence)、语用对等(pragmatic equivalence)、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以对等为基础的翻译学研究侧重于源文，因此源文的特征必须在译文中予以保留。他说：“如果译文能够满足有关结构条件的某些要求，那么源文与译文便存在着对等。这些相关条件跟内容、风格以及功能相关，因而，对等的要求便体现为：源文的特性必须得以保留，也就是说，源文的内容、风格及功能必须得以保留，或者译文至少应该尽可能地保留这些特征。”（Nord, 2001: 7）贝克则在《换言之：翻译教程》中详细论述了词层对等、词层以上对等、语法对等、篇章对等，并创新性地提出了语用对等(pragmatic equivalence)。

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或译介学)与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刚刚相反，“非刻意对等，而是自认操纵”（Snell-Hornby, 2001: 22）。这一研究取向的代表学者有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朗贝尔(José Lambert)、赫尔曼斯(Theo Hermans)、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图里(Gideon Toury)。他们专门研究被对比语言学理论家斥为难以用于严谨分析或科学解释的离经叛道的文学翻译。他们“把文学翻译看做是多元系统中的一员，不断争取生存和主导地位，以色列的学者还强调，翻译经常在他们的文学系统中充当着首要的、创造性的和革新性的角色。因此，这种方法在本质上把翻译视为一种自足的文本类型，视作是目标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非是对另一文本的复制”（Snell-Hornby, 2001: 24）。这一研究取向以描写(descriptive approach)为研究方法，反对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中的规定性和评价性的研究方法，并将研究

重点从翻译过程及相关问题转移到翻译结果，即翻译文本的历史性。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源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2007: 10)。赫曼斯(Hermans, 1985: 10)概括了这一研究取向的基本特征，引用如下：

……把文学视为复杂的动态系统，坚信在理论模式和实际的个案分析之间应有持续的相互作用；采用描写的、目标语取向的、功能的和系统的文学翻译研究方法；关心制约译作产生和接受的规范和限制因素，关心翻译和其他文本类型的关系，关心翻译在特定的文学环境和多种文学环境互相影响之中的地位和角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学者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从而形成了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范式。1990年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他们认为翻译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为了发挥其重要作用，翻译学不应该继续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应该把比较文学视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Bassnett & Lefevere, 1990)。时隔三年，苏珊·巴斯内特又在《比较文学批判导论》一书中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993: 161)。在这些学者的号召下，一批学者开始从文化的视角深入研究翻译，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范式。这批学者主要有法国学者和理论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国学者沃夫尔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等。他们摒弃了忠实、对等的原则，关注焦点从对比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怎么译’的问题转移到了‘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

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也就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翻译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技术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上去了”(谢天振,2008:44)。他们视翻译为一种改写行为,译本是译者在目标语社会中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这种研究范式聚焦于翻译的外部因素,将翻译活动看做是凸显主体、反叛原作、争取独立的解放运动。

以上这三种研究范式,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对比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具备术语准确、操作性强的特点,并使翻译学研究愈益精密细致,逐渐发展为一门科学,有利于翻译教学和译作评估。然而,其盲点在于始终着眼于文本层面,总跳不出源语和目的语之间一一对应的理念,体现了静态的语言观念,“是将源语文本作为起点,设立各种参数来衡量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差异”(Sager,2012:26),脱离了语境追求源语与目标语在各个语言层级(词汇、语法、句子、篇章、语用等)上的绝对对等,从而完全忽视了整体文化和社会对语言的影响。

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将研究对象置放在跨文化交际的大背景下,研究由误读、误释、误译而引发的文学形象的扭曲与变形,并探究其社会文化缘由,从而审视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这种研究“不再纠缠于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的总结,不再局限于语言转换的正确与否,不再热衷于从语言层面上对译本作价值判断,也不再以建立翻译规范、指导翻译实践为最终的旨归”(曹顺庆,2005:194),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文学和文化研究,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理路上大异其趣,使得“到了90年代,翻译研究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文化研究的传媒研究之范畴”(王宁,2005:5)。

文化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揭示了翻译的文化属性,构成了翻译学一直缺少的外部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然而,这一研究范式却忽视或否定了翻译的语言属性和翻译学的内部研究,在对对比语言学派翻译观的反拨中单向度地夸大了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从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导致“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的位置的危险”(许钧,2003a:56)。如果没有把翻译作为翻译实践来研究这一根基,翻译研究将混同为宽泛的文化研究,翻译理论将变成宽泛的文化理论,翻译学或将名不副实,甚至不复存在。

第一,以上三种研究范式均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的理论均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服务,三种范式都没有将翻译视为整体进行综合研究。究其实,翻译



研究是一门综合学问，既需要语言学的内部研究，也需要文化学的外部观照。舍弃任何一面，势必残缺不全。语言层面的文本分析是文化层面的社会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础，不基于文本分析的社会分析难免会落入言之空泛、不得要领的窠臼，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联系主客体之间的重要媒介；文化层面的社会分析是语言层面的文本分析的深化和提高，缺乏文化分析的文本分析终归难逃肤浅和不全面的责难，因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分析激活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翻译也并非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语言活动，而是受到了外部社会语境、诗学规范和语言形式的操控。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综合分析才能保证翻译研究的全面、丰富和深刻。社会话语分析既分析文本，也就是研究翻译现象的微观层面，也分析这一现象的结果和对目标文化的作用，即探究它的宏观层面。翻译的社会话语分析就是建立在文本分析基础之上的社会语境、诗学规范和翻译语言的综合分析。这种分析能够有效地弥合各种不同范式之间盲人摸象、言人人殊的尴尬境况，能够对翻译主体以及其他翻译现象得出全面和深刻的审视和观照。

第二，在翻译研究的三种视角中均离不开译者主体性的张扬，无论是源文解读，还是译者的种种“创造性叛逆”，抑或是文化交流，均离不开译者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作用体现在对“原作者业已形诸文字的原作进行透视观照，竭力了解并把握原作所呈现的林林总总及原作者所要昭示的客观世界以及情感世界，即喜怒哀乐，借此达到译事的完成”（王文斌，2007：20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即译介学中，文学作品的传情达意、原作者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意向的传达，均离不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文学交流中异质文化的传递和异域形象的重构，离开译者寸步难行。译者主体性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比较文学视野下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在翻译语言学研究，译者始终是个“哑角”，生活在源文的阴影下，不敢越雷池半步，译者主体性被笼罩在语言科学分析的光环之下，处于隐身状态。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客观受动性，强调译者的历史局限性以及译入语文化对译者的制约作用。在文化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从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作者已死”，只有译者才能保证原作的生命延续，译者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张扬。由此可见，仅从语言的单向度去分析译者主体性，势必残缺不全，不得全貌，而仅从哲学的抽象层面分析译者主体性，也难免是空中楼阁，沙上城堡。国人重史，认为本质存在于历史之中，不朽的要义是使个体的生命融入历史的行程之中，译者主体性研究必须从翻译史中探赜索隐。这就是笔者为什么将译者主体性研究置放在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和近百年的西学翻译中予以